

復興崗學報

民 95，88 期，149-180

從軍事和經濟角度解析 中共提倡新安全觀之困境

馬振坤

政治學系中共解放軍研究組

副教授

摘 要

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於 1997 年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觀，隨後並被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所沿用。中國大陸在經歷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之後，國家所處內外環境已全然不同，值此之際，江胡二人提倡此新安全觀與鄧小平 1980 年代推動改革開放之初所提之安全觀，其動機與意涵自然不同。本文分從經濟及軍事角度說明江胡二人提出新安全觀背後之困境與考量。

關鍵詞：安全觀、中共軍事、貧富差距、城鄉差距、三農問題

Dilemma of China's New Security Concept – From Economic and Military View

Ma, Chengkun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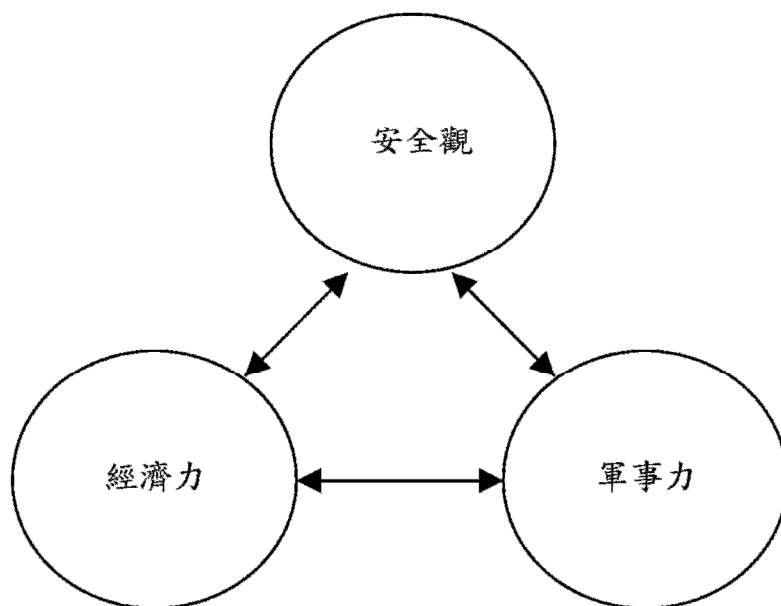
China's third-generation leader Jiang Zemin had call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in 1997, which focuses on enhancing trust through dialogue and promoting security through cooperation. In China's view, the core of such new security concept should include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equality and coordination. Hu Jintao, Jiang Zemin's successor, follows Jiang's policy and is a strong advocate of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After Deng Xiaoping started reform and open-up policy, economic, soci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transition happened rapidly throughout a quarter century. Therefore the motivation and deliberation of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called by Jiang and Hu are naturally different to Deng's. This research analyses Jiang and Hu's new security concept through economic and military approach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ir decision dilemma.

Keywords : security concept, PLA, wealth gap, rural-urban divide, three rural issues

壹、前言

1997年4月23日，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莫斯科與俄羅斯簽訂「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¹首次提到要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1999年3月26日江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提出中國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並於2000年9月6日在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的演說中重申此論點。²此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便成為中共新安全觀的主要內涵，到了2005年9月15日胡錦濤出席聯合國成立六十週年領袖會議發表演說時，仍強調這項由江澤民提出的新安全觀。³

然而新安全觀能不能有效建構，除了提出論述外，更依賴於本身的國力尤其是軍事和經濟力量能否作為落實此論述的依靠，其中經濟力是軍事力成長不可或缺的動力，軍事力則有助於安全觀的具體實踐，而安全觀的落實又可塑造有利經濟持續發展的環境，為經濟力成長所必須。因此安全觀、軍事力、經濟力乃構成交互影響的循環，三者相互依存。



¹ 〈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97年4月24日，版1。

² 江澤民，〈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9月7日，版1。

³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人民日報》，2000年9月16日，版1。

中共自建政以來，國家發展策略的擺盪，正呈現出此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指出只有發展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才能有更大的進步。⁴毛澤東此語點出了經濟力與軍事力二者之間的關連性，但爾後毛掌權期間輕經濟發展而重軍事對抗的主要原因則在他對於中國所處世局的認知，毛澤東認為中國仍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包圍和侵略威脅，因而中國必須傾力發展核武，以嚇阻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所以毛強調「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⁵。

鄧小平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針對裁軍百萬所作的談話更能呈現安全觀、經濟力與軍事力三者間的相互依存性。他在談話中指出世界大戰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不會發生，⁶故軍隊建設必須從臨戰狀態轉變到和平時期建設軌道上，「在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以現代化為中心的根本建設，全面提高軍隊戰鬥力和在現代條件下的自衛能力」⁷，鄧小平強調經濟建設「是國家發展的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⁸，而和平時期的軍隊建設，「從根本上講，是為了充分地利用和平環境來建設軍隊，更好地培養、生成、積蓄和增強軍隊戰鬥力」⁹。從鄧上述的談話可以看出，鄧的國家安全觀與上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不同，安全觀的轉變使得軍隊建設指導思想也跟隨出現「戰略性轉變」，從臨戰狀態進入平時階段；而軍隊建設需要經濟力的挹注，但是當時的中國剛實施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仍處於初始階段，因此鄧提出軍隊建設必須服從於經濟建設的「大局」，讓國家整體經濟能夠儘速發展，當經濟發展的愈順利，國家便能投入愈多資源於軍隊建設。經濟和軍隊建設的良性互動能否順利，又取決於中國所處的外環境是否如鄧所宣稱的「進入一個新的和平時期」，而中國本身的行為，也構成影響世局朝向和平或戰爭的條件之一，因此鄧小平才會以改革開放和裁軍百萬這兩項經濟及軍事政策來向世人表明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善意，以此換取國際社會的認同，進而爭取和平的持續來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軍隊建設。

本文從經濟與軍事的角度探討江澤民、胡錦濤提出新安全觀背後之困境與考量。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推行至今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大陸經濟和軍事發展都呈現相當成果之際，中共領導人再提出更具和平善意的新安全觀，其動機

⁴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頁271。

⁵ 同上，頁271-272。

⁶ 王成斌主編，《鄧小平現代軍事理論與實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74-75。

⁷ 高連升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頁275。

⁸ 《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卷3，頁129。

⁹ 高連升主編，前揭書，頁277。

縱使與當初鄧為了全力發展經濟而改變毛澤東「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思維相同，其所面對的內部環境也已不同於一九七〇年代末文革結束後人民對長年政治運動的厭倦以及對經濟改革的渴望。現今中共領導者面對的是更多民眾對其政權的不滿，以及急須中央挹注大量資源以解決民眾迫切需求之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部門。因而新安全觀的提出是否係如同當年鄧小平一樣，希望藉由塑造外部和平環境來提供經濟持續發展，使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維持過去十年的高成長率；或者是企圖透過經濟力迅速增長同步推動軍事快速現代化，軍隊建設繼續呈現跳躍式的進步；抑或還有其它因素，是本文欲探討之主題。

貳、經濟力成長帶動軍事力發展

中共於 1979 年懲越戰爭「慘勝」後，鄧小平即提出「軍事現代化」的建軍要求，著手推動軍隊改造。由於甫經歷文革動盪，共軍武器裝備陳舊，人員素質低落且紀律鬆弛，故在軍事改革上步履緩慢。加以當時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未久，中國大陸市場經濟方要萌芽，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偏弱，能夠投入的國防經費相當有限。1980 年中共國防支出為 193.84 億人民幣，¹⁰卻已佔其國民生產毛額（GDP）的 4.3%。¹¹雖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 1980 年代中國大陸 GDP 成長 4.2 倍，平均成長率高達 15.5%，¹²但由於 1979 年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前人均 GDP 僅有 266 美元，¹³在已公佈的統計數據中，遠低於當時世界主要開發中國家如亞洲四小龍以及南美洲的巴西、智利等國，僅高於緬甸的 162 美元。¹⁴ 國家財政處於落後國家的水平，因此終其 1980 年代，中共軍事現代化的主要成果僅展現在 1985 年裁軍百萬，以及將所裁部隊改編為武警部隊這兩項工作上。

1991 年波斯灣戰爭，讓中共體認到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變革，否則不足以因應未來的戰爭。江澤民在波灣戰爭結束後，提出「把未來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可能發生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¹⁵，並且強

¹⁰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2005 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頁 273，表 8-4。

¹¹ 中共 1980 年國內生產總值為 4517.8 億人民幣，同上，頁 51，表 3-1。

¹² 中國大陸 1980-1989 的 GDP 詳細數據參閱同上。

¹³ 中華民國外貿協會，《1979 年主要國家平均每人 GDP》，《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http://www.investintaiwan.org.tw/theme01_c/c_t01_01_10.htm〉。

¹⁴ 1979 年我國人均 GDP 為 1893 美元，韓國為 1707 美元，南美洲的巴西為 1862 美元，智利為 1888 美元，詳細數據參閱同上。

¹⁵ 江澤民，〈加強對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學習和研究〉，《論國防和軍隊建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 90。

調「這是我軍軍事戰略上的一個重大調整」¹⁶。因此在 1991 年中共的國防經費僅有 330.31 億人民幣，¹⁷但是到了 1992 年，就增加了 14.4%，達到 377.86 億。¹⁸另外，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後為爭取國際社會好感，加大改革開放的幅度，使得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發展迅速。六四事件對中共經改之路的影響僅呈現在 1989 和 1990 年 GDP 的成長速度由原本 1988 年極看好的 24.8% 成長率頓挫為 13.3% 和 9.7%，到 1991 年便又恢復到 16.6% 的成長率，1992 年成長率更高達 23.2%。¹⁹經濟實力的快速成長讓中共得以挹注更多資源於國防事務上，此後隨著「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建軍目標的推動，中共國防經費逐年都以兩位數字的比例攀升，到 2004 年達到 2200.01 億人民幣，²⁰是 1980 年的 11.5 倍。

另外，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讓中共體認到共軍除了二砲部隊可以對台灣形成具體威脅外，其海空軍現代化程度與美軍和我國國軍之間，仍存有明顯差距，這也使得共軍渡海攻台的想定成為空談。因此在危機期間，江澤民就已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坦言「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高技術兵器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現代戰爭形態已發生很大變化，對軍隊的現代化的水平要求更高了」²¹。台海危機結束後，中共總結經驗，更認知到進一步軍事變革的重要，乃由江澤民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時，要求共軍要「加強質量建設，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²²，江並在此次報告中提出三年內裁軍五十萬的決定，²³具體落實精兵政策。

在持續投入大批國防經費的挹注以及軍隊規模進一步壓縮下，1997 年以後，是共軍建構現代化軍力的成長飛躍期。其向俄羅斯購買的蘇愷 27、蘇愷 30 戰機、伊爾 76 式運輸機、現代級導彈驅逐艦、基洛級潛艇等陸續交付成軍；自製的殲 10 戰機、早期預警機、旅海級導彈驅逐艦、宋級柴電潛艇、88 式主戰坦克也逐一正式服役，尤其二砲部隊針對台灣部署的東風 11、東風 11 甲、東風 15 導彈，更在數量及質量上均快速增長。另外，093 核動力攻擊潛艇、094 核動力導彈潛艇、巨浪二型潛射導彈、長程巡弋飛彈、無人飛行載具，²⁴也都在進行研發測試

¹⁶ 同上。

¹⁷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273，表 8-4。

¹⁸ 同上，頁 273，表 8-4。

¹⁹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51，表 3-1。

²⁰ 同上，頁 278，表 8-13。

²¹ 江澤民，《大力加強軍隊質量建設》，前揭書，頁 194。

²² 同上，頁 285。

²³ 同上，頁 286。

²⁴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Y2004 Report to Congress on PRC Military Power-pursuant to the FY 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當中，成軍服役時程已可預期。在太空戰力方面，北斗系列衛星已完成三顆部署，²⁵這使得中共初步擁有局部衛星導航能力，與此同時中共並加入歐洲「伽利略衛星定位計劃」，與歐洲國家共同建構新的不受美俄牽制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²⁶這將使中共未來在軍事導航用途上突破現有的瓶頸。而在 2003 年神州五號太空船完成首次載人飛行任務，以及 2005 年神州六號搭載兩名太空人創下中國人在太空中活動的多項紀錄後，中共在長程和洲際導彈發射技術、彈頭於太空軌道變軌技術、彈頭重返大氣層導航技術、以及返回過程中的防熱、抗震技術等，都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除了武器裝備的更新外，中共亦於 2003 年宣佈 2005 年以前再裁軍廿萬，以加速推動軍隊現代化建設。²⁷

從硬體的更替視之，共軍武器裝備現代化的速度相當快，尤其海空軍，從原本主戰武器在續航力和火力俱不足的條件下，僅能從事領空防禦和近岸防禦，²⁸迄今其續航力已能突破第一島鏈進入西太平洋，而其機艦上配備的武器也已然能進行視距外的遠程攻擊。二砲部隊在台海當面部署的東風 11、東風 15 導彈數量也大量增加至八百枚以上，發射導彈所須之發射架機組數量亦相應增加。陸軍雖然不斷裁減步兵部隊，但是特戰部隊的編制規模卻不斷擴增，且步兵朝向摩步化、全軍朝向機械化建軍方向發展。由此可知共軍自 1990 年代以來的軍事現代化，確實逐步朝向江澤民所提出建構高技術作戰能力的方向發展，²⁹且由於經濟實力的增長，其在 1996 年以後所投入的國防經費遠較之前為多，這使得共軍對於高科技武器的採購和研發，從 1996 年以後明顯增加。若和改革開放之初剛打完懲越戰爭「慘勝」的共軍相比，則現今的共軍已遠非昔日阿蒙，其軍事現代化的努力可用突飛猛進、成果豐碩來形容。1996 年台海危機時，美國尚能以派遣兩艘航母作為嚇阻共軍進一步企圖的籌碼，但是隨著共軍持續建構現代化武力，目前

USA, p.35.

²⁵ 〈第三顆北斗導航定位衛星發射成功〉，《解放軍報》，2003 年 5 月 25 日，版 1。

²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洲共同使團，《中歐將簽署伽利略計劃技術協定》，2004 年 5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洲共同使團網站》，〈<http://www.chinaembassy-org.be>〉。

²⁷ 〈江澤民：在國防科技大學成立五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3 年 9 月 2 日，版 1。

²⁸ 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中共空軍主戰機種以殲七和殲八為主，作戰半徑僅六百公里，海軍則以三千噸的旅大級驅逐艦為主，由於海軍航空兵配備的殲八戰機續航力有限，無法提供足夠的空中掩護，加以戰艦本身防空火力薄弱，因此僅能從事近岸防禦作戰。

²⁹ 共軍軍事現代化之內涵，於美伊戰爭結束後更聚焦於信息化作戰能力之建構。參閱馬振坤，〈美伊戰爭對中共軍隊建設之影響〉，《軍事社會科學的功能與應用（下）》（台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4 年），頁 204-212。

美國已必須用擴張海軍艦隊的方式，來因應未來共軍海上武力的崛起。³⁰由此可知，中共的軍事力量確實迅速走向現代化，其海空軍的武力投射範圍已可達第一島鏈東側，遠超過 1990 年代之前的近岸海域。這有助於其在與週邊國家協商建構新安全觀所描繪的國際新秩序時，取得更大的發言權。

參、軍事現代化需克服之障礙

共軍在歷經十餘年的現代化努力，並挹注大量國防經費之下，各軍兵種主戰武器裝備更新迅速，的確讓軍隊的有形戰力在短時間呈現跳躍式的進步。但是一支軍隊戰力的養成，除了武器裝備等硬體外，還端視人員素質、教育訓練、組織編裝與指管通情等軟體條件的配合。如果組成軍隊的人員素質低劣、教育訓練鬆散、組織編裝不適合進行現代戰爭，以及未能建構適當的指管通電情監偵系統（C4ISR），即便有新式的武器裝備，也無法充分發揮其戰力，使得整體軍事力的成長無法跟硬體的更新成正比。中共雖然推動軍事現代化有相當成效，但是在兵員素質、教育訓練、組織編裝以及指管通情系統等領域，仍存在需克服之障礙。

一、兵員素質

根據中共兵役法的規定，凡年滿 18 至 22 歲、初中畢業以上學歷之男女青年，都有應召服兵役的義務，少數民族及偏遠地區則在學歷方面尚放寬至小學畢業以上。由於大陸人口眾多，共軍又持續縮減規模，不需要每一位役齡青年都入伍服役，因此共軍對於屆齡青年是採取「擇優篩選參軍服役」，故其兵員素質在理論上應屬役齡青年當中較優秀者。

但是由於中國大陸社會城鄉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加以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之下，民間部門提供高等教育人才的工作機會豐富，而且待遇不斷攀升，但是軍人的待遇近年來雖亦有調升，但與社會進步的幅度相比，仍屬偏低。因此學有專精的年輕人才多選擇到社會上就業，較不會選擇從軍；加以近年來中共大力進行裁軍，也影響年輕人對軍人生涯的認知，認為軍中的發展性有限。故共軍兵源仍以農村青年為主，而農村在近年來卻苦於教育資源不足，愈來愈多農村地區無法提供和維持應有的國民義務教育水平，同時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之下，愈來愈

³⁰ 美國國防部計劃增建 32 艘作戰船艦，使美軍艦隊數量從目前 281 艘增至 2020 年時 313 艘，以因應中共海軍艦隊的擴張，參閱 David S. Cloud, "Navy to Expand Fleet with New Enemies in Mind",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2005, 〈<http://www.nytimes.com>〉。

多農民家庭無法供給自己子女完成義務教育所須的學費，因而農村子弟所接受的實質教育水平逐年下降，這也使得共軍所依賴的農村兵源整體素質仍舊偏低。

傳統上共軍軍官多係出身行伍，在服義務兵役期間，經單位主管保薦投考軍校錄取，接受大專或本科軍事院校教育之後，成為正式軍官。而軍事院校的學生當中，來自部隊的「部隊生」與高中或中專畢業生報考軍校錄取就讀的「地方生」，人數比例約為 4：1，因此共軍軍官整體素質及文化水平並不高。目前共軍軍官具正規本科學歷者不到 30%，研究所碩士學歷僅有 3.9%，多數軍官進修的途徑並非就讀正規院校，而是靠函授、自學考試等方式來提升學歷。³¹而透過非正規教育途徑取得學歷者，其實質知識水平的提升往往十分有限。

不可諱言，共軍近年來努力提升人員素質，尤其各項高科技武器逐一成軍服役，需要大量具備專業素養的人員來操作。有鑑於農村兵源素質不高，共軍近年來不斷以招募民間大學生入伍服役、和招收民間大學生成為國防生，使其在畢業後投身軍旅的方式，來提升軍隊幹部素質。同時共軍也開辦從民間招收具專業技術者到軍中擔任士官的試點工作，³²在此之前共軍的士官都是從服役期滿或繼續留營的義務役士兵中去甄選，新法則是根據士官「編制專業、分期和需求」的情況，從民間招募專業技術人員，尤其是新型武器裝備所亟需的操作人員。中共中央為了提升軍隊人員素質，還於 2003 年 9 月發佈實施人才戰略工程規劃，³³由各軍兵種部隊與民間大學院校簽訂軍事人才聯合培養協議書，以提升軍隊幹部的素質。從共軍這些培訓人才的措施可以看出，這些努力雖不能保證立即改善指揮人員的軍隊幹部的素質，卻可以突顯出共軍積極提升人員素質的決心與作為，

值得注意的是，共軍雖然積極推動國防生及大學生入伍，希望藉此提升基層幹部素質，但是在基層部隊主官都是從共軍各專業軍事院校畢業，具濃厚的門戶本位主義心態下，對這些大學生的軍事學能基本上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因此這些投身軍旅的大學生能否在軍中有好的發展，真正發揮其能力專長，而不會對軍隊失望，進而在服役期滿後就退伍離開軍隊，尚待觀察。整體而言，共軍海空軍及二砲部隊所需的專業人員素質的確日漸提升，然而一般野戰部隊的人力素質則尚未有明顯改善。

二、教育訓練

³¹ 〈中國軍隊人才戰略工程揭秘〉，《鏡報》（香港），2003 年 8 月號；另參閱吳恆宇，《中共新軍事革命：人才培育與院校教育改革》（台北：大屯出版社，2004），頁 79。

³² 〈我軍首次試行直接從公民中招收士官〉，《解放軍報》，2003 年 11 月 5 日，版 2。

³³ 〈中央軍委頒發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解放軍報》，2003 年 9 月 8 日，版 1。

1999 年 4 月，中共中央鑑於聯軍在科索沃戰爭中所表現出的現代化作戰模式，認知到全面提升軍隊人才素質的重要性，江澤民乃要求共軍「切實把院校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的要求，³⁴江並且提出「改革院校體制編制、從民間大學招收國防生、提升軍官學歷、提高教學質量、以及完備教育立法」等五類要求。³⁵到了同年 6 月，中共於第十四次全軍院校會議中，針對軍事院校教育，提出要建立「適應世界軍事發展，和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需要，具有我軍特色，可持續發展的軍隊院校教育體制」，³⁶至此共軍軍事院校新階段的教育改革基調底定，以提高基礎幹部培訓層次、完善在職幹部繼續教育為主，並以終身學習為核心，實現 2010 年 10 所以上院校達到外國先進水平的目標。在此目標下，各軍兵種以撤銷、合併、重建等方式來調整軍事院校體制編制，使之從原先「數量多、規模小、單科為主」，轉變為「數量少、規模大、綜合性為主」的新型院校。³⁷綜觀共軍近年來軍事教育訓練，其焦點集中在培養專業軍官和專業士官教育，並且致力培養未來能夠在戰場上擔負諸如信息溝通、聯合作戰、先進武器操作、以及指管通情系統整合等任務的高素質軍隊幹部，以使共軍成為一支現代化、專業化的軍隊。³⁸

在部隊訓練方面，近年來共軍訓練方式較明顯的變革係著重於培養部隊的實戰能力，尤其美伊戰爭後共軍就將部隊演訓的重點置於局部性、高強度、速戰速決的作戰型態，並且將其訓練流程標準化，並增加演訓的真實性。³⁹因此目前共軍在進行演習時，除了專業軍兵種考量所需設施，而固於在特定地點進行演訓外，一般野戰軍會將部隊置於一般野外，不再侷限在固定的訓練基地。而演習項目也不再像以往依腳本推演，通常演習導演部只給參演雙方部隊設定演習大綱背景，不設定具體的程序和規範，由部隊本身根據實際情況和天氣、地形以及裝備性能等條件自行調整因應。⁴⁰在各軍種實際訓練上，共軍二砲部隊除了進行各型號導彈的試射訓練外，還著重於通信訓練、跨區機動演練、以及導彈陣地保護等；空軍除建立「全時段、全空域」作戰能力外，還著重夜航訓練、海戰能力、奔襲戰力、戰術對抗、陸海空協同作戰、信息作戰等科目的訓練；海軍則除了正常的航行課目外，還著重信息作戰、以及不同艦艇間人員相互交流的交叉培訓等。

³⁴ 江澤民，〈努力培養和造就大批高素質的新型軍事人才〉，前揭書，頁 374-379。

³⁵ 同上，頁 379-384。

³⁶ 吳恆宇，前揭書，頁 144-145。

³⁷ 同上，頁 191-193。

³⁸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 cit.*, 2004, pp.25-26.

³⁹ *Ibid.*, p.25

⁴⁰ 〈成都軍區某部近似實戰條件下開展對抗演練〉，《解放軍報》，2003 年 8 月 20 日，版 1。

從上述共軍對教育訓練方式的變革視之，中共的確企圖藉由體制與訓練模式的改變，來提升軍事教育與部隊訓練的成效，進而能夠培養出高素質的軍官幹部，增強部隊戰鬥力。但是由於軍事院校傳統教育思維根深蒂固，部隊弄虛造假作風普遍，都使得共軍教育訓練的興革成效有限。就以 2005 年 8 月中俄舉行的聯合軍演為例，便足以說明其中缺失。在該次演習中，共軍與俄軍同時空投 12 輛傘兵裝甲車，以配合傘兵空降作戰。俄軍在空投時係駕駛坐於車內隨車空投著陸，共軍則採空車空投，這顯示其人員訓練尚未及可隨車空投的程度；而且共軍空投的 12 輛裝甲車，有一輛在著陸時翻覆，⁴¹戰損率為 8.3%，而俄軍對同類型空投的戰損要求標準為 1%，顯見共軍空投水平不如俄軍；另外根據公開的演習照片發現，共軍傘兵在空降著陸時並未配掛武器，國際間部分媒體據以稱共軍傘兵武器是在著陸之後統一發給，⁴²如果此說屬實，則共軍傘兵部隊的訓練水平恐怕大有問題。而共軍坦克部隊在演習戰場上的作戰編隊模式老舊、砲兵陣地過密且欠缺安全防護等，都曝露出共軍雖擁有新式武器裝備，但是軍官幹部的作戰思維卻無法與時俱進，而部隊的整體訓練水平仍然有待加強。

三、組織編制

共軍於 1997 年底江澤民宣佈三年內裁軍 50 萬後，⁴³雖然企圖藉由裁軍使軍隊組織結構朝向「精兵、合成、高效」發展，但實際上仍存在數量多、規模大、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因此江澤民於 2003 年 9 月 1 日宣佈在兩年內再裁軍 20 萬，並於 2005 年底前完成。⁴⁴這波裁軍重點為優化結構、理順關係、提高質量和改善官兵編配比例，在具體措施上，則以裁撤海空軍的軍級基地及指揮單位，以及陸軍的非戰鬥單位。⁴⁵因此共軍這波裁軍是以裁減後勤部隊為主，同時將非戰鬥功能的任務轉移至民間部門，而正規部隊則未減少。⁴⁶同時此次裁軍的目的在於集中有限資源於重點單位及設備，例如傳統野戰部隊朝向機械化步兵、空降兵、裝甲兵、陸航等兵種發展。⁴⁷另外，中共也利用這次裁軍調整軍隊官兵比例、機

⁴¹ 〈中俄聯合軍演 傘降突擊 中方戰力遜色〉，《中國時報》，2005 年 8 月 22 日，版 A13。

⁴² 同上。

⁴³ 江澤民，《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是國家安全和現代化建設的基本保證》，前揭書，頁 286。

⁴⁴ 〈江澤民鄭重宣告：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我軍再裁減員額 20 萬〉，《解放軍報》，2003 年 9 月 2 日，版 1。

⁴⁵ 《香港文匯報》，2004 年 8 月 9 日，版 2。

⁴⁶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 cit.*, 2004, p.38.

⁴⁷ Ibid.

關和部隊比例、戰鬥部隊和後勤部隊比例，⁴⁸讓軍隊體制趨向精幹化與效能化，作戰指揮趨向扁平化，同時也藉此改革後備軍人和民兵的體制，加強二者在國防事務的比重與功能。⁴⁹

除此外，共軍在觀察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美伊戰爭後，體認到現代戰爭戰場多維化的特性，⁵⁰因此近年來積極將傳統以地面部隊為主的組織編制，調整為陸海空三軍並重的新型軍隊體制。具體措施包括在 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時，將空軍司令員喬清晨、海軍司令員張定發、以及二砲司令員靖志遠納入中央軍委會，使中央軍委人數增至 11 席。⁵¹另外還拔擢了南海艦隊司令員吳勝利、瀋空司令員許其亮出任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⁵²這是共軍總參謀部首度有非陸軍出身者擔任副總參謀長，顯示中共中央軍委確有提升海空軍地位的決心。

從中共藉由裁軍調整軍隊體制編制及調整高層人事視之，共軍的確在朝向三軍均衡並重的方向發展，此發展確實符合現代戰爭多維化戰場聯合作戰所需。但是由於軍隊作戰指揮體系仍然維持舊有模式，以及欠缺聯合作戰的實戰經驗，因此共軍雖然努力調整其組織編制，但是在短期內仍然無法具備現代化軍隊聯合作戰之能力。⁵³

四、C4ISR

共軍近年來對高技術戰爭的認知由原本以高科技武器為主，逐漸轉為強調以信息技術為核心，因而著重現代化 C4ISR 的建構。⁵⁴尤其美伊戰爭強化了其對高技術戰爭以信息為核心的思維，「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成為共軍追求之建軍目標，也成為共軍新年度軍事訓練工作的總要求。⁵⁵其實共軍於 2002 年便已建設完成全軍指揮自動化網路，具備了橫向連繫總部、軍區軍兵種、武警總部，以及縱向連繫師級以上作戰部隊的功能，可以提供各級指揮機關和作戰部

⁴⁸ 《香港文匯報》，2004 年 3 月 3 日，版 2。

⁴⁹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 cit.*, 2004, p.38.

⁵⁰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 cit.*, 2005, p.17.

⁵¹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調整充實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決定〉，《人民日報》，2004 年 9 月 20 日，版 2。

⁵² 《香港文匯報》，2004 年 7 月 17 日，版 2。

⁵³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 cit.*, 2005, pp.17-18.

⁵⁴ *Ibid.*, p.6.

⁵⁵ 〈總參部署全軍新年度軍事訓練工作〉，《解放軍報》，2004 年 2 月 1 日，版 1。

隊即時、高效、統一的信息處理平台。在總參發佈新年度軍事訓練工作總要求後，各部隊在各項軍事建設和訓練中，都以信息化作為任務的重心。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商用資訊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國家科研機構也以此為研究重心，都讓共軍能夠加速信息化建設的腳步。⁵⁶而民間通訊產業的發達，共軍透過軍民技術交流，把過去依賴落伍的類比式通訊轉變為以光纖、衛星、電磁、改進式脈衝等方式為主的數位式通訊。⁵⁷目前共軍 C4I 具體建設成果為已鋪設了數千公里的光纖電纜，連結到大部分的軍事單位，而且已架設完成全軍網路系統，提供各單位數據化的指揮、管制、訓練、後勤、財務、教育等用途。⁵⁸

在情報偵監方面，中共目前已分別發射偵察、氣象、通信與海洋監測等衛星進入地球軌道，可以對台海區域之陸地、大氣、海洋、電子信號等進行長期且完整的監控。除了衛星外，中共尚有自行改裝或研製的電子偵察機數款，可進行電子偵蒐或作為空中指揮平台，例如改裝俄製圖 154 型客機而成的電偵機、以及由運 8 型運輸機改裝而成的運 8 警戒機等，最新者則有中共以伊爾 76 運輸機研製而成的空警 2000 大型空中預警機。

雖然中共投入大量資源建構現代化 C4ISR 系統，但是由於共軍不同軍兵種在推動 C4ISR 信息化工程上各自為政，造成各部門的建設成果往往出現「軟體不相容、硬體不配套」的窘境。例如前述中共雖然已擁有大型空中預警機，但是在 2005 年 8 月的中俄聯合軍演中，卻未見到此型飛機參與演習，僅有俄軍出動了 A50 預警機，可見共軍參演部隊使用的各項主戰武器平台之間並未完全形成現代化軍隊作戰所需的數據鏈連結，尚未真正具備其所謂信息化戰爭的實戰能力。

肆、經濟成長伴隨之危機

共軍跳躍式現代化的主因在於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中共能夠挹注大量經費到國防領域。但是這不意味著中共軍力能夠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而平行提升，因為中共當局必須投入愈來愈多資源處理因為經濟發展過快所帶來的諸項社會問題。2004 年中國大陸 GDP 為 159878 億元，⁵⁹同年官方公佈的國防預算為

⁵⁶ Evan S. Medeiros, *Testimony: Analyzing China's Defense Industr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CA: RAND Corporation, 2004), p.10.

⁵⁷ Ibid., pp.9-10.

⁵⁸ Ibid., p.10.

⁵⁹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出版的《2005 年中國統計年鑑》刊載，該年 GDP 為 136875.9 億元，但是中共國家統計局於 2005 年 12 月修正此數據，改為 159878 億，見〈我國去年 GDP 達 159878

2117 億元，⁶⁰占 GDP 的 1.3%；若以 SIPRI 的估算，則為 354 億美元，占 GDP 的 1.8%；但是在 1980 年經濟改革剛開始時，中國大陸 GDP 只有 4517.8 億元，國防經費卻有 193.84 億，佔了 GDP 的 4.3%。⁶¹由此可知，中共的國防經費在金額上是增加的，但是在 GDP 所占比例卻是下降的。這反映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成果並不能成比例地挹注到國防領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各個生產單位替代政府提供人民衣食住行等生活功能逐漸瓦解，這使得人民在失去原本穩定收入的同時，也失去了原本由所屬單位提供的醫療、退休養老、以及急難救助等社會安全網。在市場機制優勝劣敗的競爭下，固然少數人可以成功獲取財富，但是多數人尤其是教育程度低、欠缺第二專長的農民，以及習于安定生活的國營企業職工，卻是陷入由於經濟發展導致物價不斷上漲、以及原本由生產單位支應的教育醫療退休等費用現在必須由個人自付，因此實質所得下降的困境中。

一、貧富差距問題

雖然中國大陸 1993~2004 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 9.9%，⁶²但快速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至今 0.5% 的家庭擁有 60% 以上的個人財富，貧富差距為美國的十倍。⁶³在富裕地區只有 20%、在貧窮地區只有 3% 的人口能夠享有國家提供的醫療資源，全國有 65.7% 的人沒有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就醫必須自費，而通常他們又是經濟上最弱勢的階層。經濟快速發展也使得人民接受教育的費用提高，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學費十年間上漲了廿倍，北大、清大的研究生一年學費約 14000 元人民幣，折合美金 1750 元，這對 2004 年人均 GDP 不到 1500 美元的大陸民眾來說，顯然過高。

以 2005 年前三季的統計數據來看，大陸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份和最低的省份之間的差距達到 2.36 倍，超過 2004 年的 2.31 倍；而農村居民人

億元〉，《人民日報》，2005 年 12 月 21 日，版 1。

⁶⁰ 根據中共公佈的 2004 年國防白皮書，該年國防預算為 2117 億元，但是若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出版的《2005 年中國統計年鑑》刊載，則為 2200 億元，見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273，表 8-5。

⁶¹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51，表 3-1，以及頁 273，表 8-5。

⁶² 中共原本公佈的數據為 9.7%，但中共國家統計局於 2005 年 12 月 20 日公佈修正後的歷年 GDP 數據使得平均經濟成長率提高了 0.2 個百分點。

⁶³ 〈0.5% 家庭擁有全國逾六成財富 大陸貧富差距 勝過美十倍〉，《中國時報》，2005 年 12 月 16 日，版 A9。

均現金收入最高的省份和最低的省份的差距則達到 8 倍，而 2004 年只有 4.1 倍，貧富差距惡化的年增長速度將近百分之百。⁶⁴貧富差距的擴大造成中國大陸城鄉低收入人口生活困難與入不敷出，2004 年大陸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9421.61 元，人均消費性支出則為 7182.1 元，⁶⁵有 10% 的城鎮最低收入戶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⁶⁶農村的清況更不樂觀，2004 年大陸農村人均純收入為 2936.4 元，人均年支出則為 3430.1 元，短缺 493.7 元。⁶⁷而西部十二省則人均純收入為 2157.91 元，人均年支出則為 2884.87 元，短缺達 726.96 元，⁶⁸由此可知即使是在農村當中，富農與貧農間的貧富差距也愈來愈大，據重慶市農調隊調查發現，當地農民若將收入區分為五等，則 20% 的低收入農戶人均淨收入為 741 元，而 20% 的高收入農戶人均淨收入則是 4529 元，後者是前者的 6.1 倍，而且高收入農戶的人均生活消費是低收入農戶的 3.5 倍；⁶⁹而全中國大陸共有將近 50% 的農村貧困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超過人均純收入。⁷⁰

根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提出的貧困標準計算，中國大陸的貧困人口約有兩億人；亞洲開發銀行根據支出標準估算的中國大陸城市貧困人口就有 3700 萬人；若按中共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則 2004 年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 2610 萬人，低收入人口為 4977 萬人，因而貧困人口合計為 7587 萬人，佔農村人口 10%，佔總人口 5.8%。⁷¹而如果依大陸研究單位根據中共公佈的相關統計數據推算，則 2004 年中國大陸城鄉貧困人口共有 9145 萬人，佔總人口 7%。⁷²

在社會財富的分配的統計數據上，基尼係數如果超過 0.4 就被歸屬於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社會。而根據 2004 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國大陸的基尼係數達到 0.45~0.53，高於美法英日等國的 0.3~0.4。⁷³巨大的貧富差距讓民怨日增，而人民生活的困境反映在日趨頻繁和激烈的群眾抗爭事件、以及愈趨惡化的社會治安上。過去一年中國大陸發生 74000 件左右民眾抗爭事件，而在十年前只有一萬件，另外大陸內部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指數都出現負成長，社會秩序指數從改

⁶⁴ 汝信等主編，《社會藍皮書，2006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278。

⁶⁵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337，表 10-5。

⁶⁶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278。

⁶⁷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358，表 10-18。

⁶⁸ 同上。

⁶⁹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29。

⁷⁰ 同上，頁 278。

⁷¹ 同上，頁 92。

⁷² 同上，頁 93。

⁷³ 同上，頁 376。

廿六開放至今廿六年來的年均遞減率為 1.7%，其中每萬人當中出現的刑事案件從 1978 年的 5.5 件，上升到 2004 年的 36.4 件，按照負指標計算，則年均遞減率為 7%，貪污賄賂瀆職受案率和治安案件發案率則年均遞減 1.6% 和 5.4%。廿六年來中國大陸社會穩定指數增減相抵後年均遞減率為 1.1%，這其中貧富差距穩定指數年均遞減 3.7%。⁷⁴

從上述數據可知，由於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使得各項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導致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改革開放廿六年來社會穩定與社會秩序的各项指數均呈現負成長，直接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之發展。例如，廿六年間經濟社會 27 項指標的綜合指數年均成長 5.4%，但是如果將社會秩序、社會穩定 11 項總共 38 項指標納入計算，則年均成長只有 4.3%，下降 1.1 個百分點，影響度達到 20%，而從 1991 年到 2004 年的十四年間影響度更上升到 30%。⁷⁵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擴大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穩定的負面影響，可見一斑，也對中共領導階層構成不可忽視的政治和社會壓力，迫使當局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到醫療、教育、社會福利與救濟等領域，以撫平民怨。

二、城鄉差距問題

中國大陸城鄉戶籍二元化發展始於 1960 年因毛澤東的激左路線失敗導致三年大飢荒後，為了解決糧食短缺的困難，乃嚴格限制農業人口轉移為非農業人口，所採取的權宜措施，但爾後卻一直延用至今。中共不但在戶籍制度上實施城鄉二元制，並且在內政上又以此戶籍制度為基礎，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採行不同的政策，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因為戶籍的差異而受到不同的政策待遇，形成了現今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著眼於改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並未考慮改變二元戶籍制度，加上鄧的經改政策是從農村起步，農民在“包產到戶”的開放政策下迅速獲益，城鄉尚未因經濟改革產生發展速度的差異，農民也沒有意識到戶籍制度對他們個人發展上的拘束，因此以二元戶籍制度為主的社會體制並未隨著經濟發展而改變，也造成爾後中國大陸的城鄉發展出現差距，而且差距不斷擴大。1978 年，中國大陸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343.3 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 133.6 元，二者差距為 2.57 倍；⁷⁶到 2005 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為 10493 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則為 3255 元，雙方差

⁷⁴ 同上，頁 371~372。

⁷⁵ 同上，頁 372。

⁷⁶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335，表 10-2。

距擴大為 3.22 倍。⁷⁷這還是全中國大陸整體的平均值，若是單獨統計大陸較貧窮的四部十二省，則 2004 年這十二省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僅有 2157.91 元，⁷⁸跟同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421.61 元相比⁷⁹，差距高達 4.37 倍。

由於中共在內政政策上根據戶籍採二元制，因此在各項官方提供的社會保障措施上，城鎮居民享有的各種社會福利和補貼，每年人均約三至四千元，而農民則基本上不享有這些社會保障。如果加上這項數據，那麼實際的城鄉收入差距應該在六倍左右。⁸⁰另外中共官方對於城鎮勞動者的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為 1765 元，但對農村勞動者的支出卻只有 14 元，城鄉差距高達 126 倍，⁸¹這項數據也呈現出中國大陸城鄉之間在經歷四分之一個世紀經濟發展之後所存在的巨大差異。

城鄉差距也表現在各項產業生產總值的增加速度。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計算，2005 年全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為 182321 億元，比 2004 年增加 9.9%，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 22718 億元，增加 5.2%，第二產業增加值為 86208 億元，增加 11.4%，第三產業增加值為 73395 億元，增加 9.6%。而三項產業增加值各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 12.4%、47.3%和 40.3%。⁸²從上述數據可知，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生產值的增加速度低於其它產業，而其生產總值在全國生產總值當中所佔的比例也較第二、第三產業為低。若單就大陸糧食產量與增長速度來看，則從 2001 年到 2005 年之間，只有 2004 年有 9%的成長率，2005 年即下降到 3.1%，而在 2001 年和 2003 年還分別出現了-2.1%和-5.8%的負成長。⁸³相較於農業，2001 到 2005 年的工業生產值增加速度除了 2001 年 8.7%未超過 10%外，其它四年都以兩位數的速度成長，2005 年的成長速度為 11.4%。⁸⁴在農業生產值遠低於工商其它產業的情況下，農民的經濟收入自然遠不及城鎮居民，而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也就無法和城市相提並論了。

三、教育問題

⁷⁷ 中共國家統計局，〈“十五”時期城鄉居民生活改善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5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表 14，《中共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

⁷⁸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358，表 10-18。

⁷⁹ 同上，頁 337，表 10-5。

⁸⁰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76~377。

⁸¹ 同上，頁 377。

⁸² 中共國家統計局，〈“十五”時期城鄉居民生活改善情況〉，前揭公報。

⁸³ 同上，〈“十五”時期糧食產量與增長速度〉，前揭公報，圖 2。

⁸⁴ 同上，〈“十五”時期工業增加值與增長速度〉，前揭公報，圖 3。

2004 年中共教育經費為 3365.94 億元，其中中央政府支出 219.64 億元，約佔此經費的 7%，地方政府支出 3146.3 億元，約佔 93%。⁸⁵而中共 2004 年政府財政總支出為 28486.89 億元，⁸⁶教育經費佔政府總支出的 11.8%。但是中共 2004 年的國防支出共達 2200.01 億元，佔政府總支出的 7.7%，其中中央政府支出為 2172.01 億元，⁸⁷佔總支出的 7.6%，而中央政府投入教育的經費卻不到總支出的 0.8%。即使以中央政府本身的財政支出而言，2004 年中央政府財政支出為 7894.08 億元，⁸⁸其投入教育的經費也僅佔此支出的 2.78%，但投入國防的經費卻高達 27.86%，兩者相差十倍。

2003 年，中共政府支出預算內教育經費為 3454 億元，佔 GDP 的 2.94%，財政性教育經費為 3851 億元，佔 GDP 的 3.3%。⁸⁹而財政性教育經費如果按人口平均計算，那麼 2003 年每人所分配到的教育經費只有 300 元，折合為 36 美元，只有美國 90 年代 1400 多美元的 2.6%。⁹⁰中共教育部門曾發佈“1991~2000 年十年教育發展綱要”，提出教育經費佔 GDP 的 4% 的要求，但是至今並未實現，到 2003 年，全大陸還有 17 個省、市、區沒有達到“教育法”規定的教育投入增長要求。⁹¹

在中共官方有限的教育經費用途上，又呈現明顯的城鄉差距。2003 年中共教育部的預算內經費用於農村小學和初中的只佔 31.7%，⁹²中西部地區農村的小學校舍中屬於危樓的建築物樓板面積達到 4000 萬平方米，貧困學生達 2400 多萬人。⁹³另外，2004 年中國大陸 15 歲以上人口文盲的比例達 10.3%，而在西藏、青海、甘肅、貴州、雲南等窮困的西部地區更高達 44%~16%。⁹⁴若以 2002 年為例，全大陸 12~14 歲的學齡人口中，小學畢業比例平均為 89.4%，但是在貴州、海南、甘肅、寧夏、四川、青海、西藏等七個以農村人口為主的省份，小學畢業的人口比例都在 70% 以下。而且該年中共投入的各項教育投資共有 5800 億元，其中投入於城市教育部門的經費佔 77%，只有 23% 的經費用於農村的教育部門。⁹⁵

⁸⁵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278，表 8-13。

⁸⁶ 同上，頁 273，表 8-5。

⁸⁷ 同上，頁 278，表 8-13。

⁸⁸ 同上，頁 276，表 8-11。

⁸⁹ 同上，頁 712，表 21-34。

⁹⁰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74。

⁹¹ 同上。

⁹²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713，表 21-35。

⁹³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74。

⁹⁴ 同上。

⁹⁵ 同上，頁 202。

另外中共雖然形式上在農村努力推動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化，但是實際上由於辦學經費短缺且待遇低落，無法吸引優年輕師資下鄉，故大陸農村地區中小學師資水準差，嚴重影響教學品質。據北大、清大的調查，該校來自農村的學生僅佔全校學生的五分之一。如果以人口比例來計算，則在城市人口中，專科和大學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遠高於農村相同學歷人口比例的 55 倍和 280 倍。⁹⁶

官方投入的教育資源不足導致大陸農村的教育品質無法與城市相比，加上城鄉之間貧富差距的懸殊，都使得愈來愈多農民子弟無法順利完成學業，進而影響他們透過教育的途徑脫離貧窮的機會，也使得大陸農民更加陷入世代貧窮的惡性循環當中。2004 年青海師範大學 6841 名學生當中，有 4167 名貧困生，佔學生總額 60%，其中有 2908 人屬於中共界定的特困生。目前大陸以學雜費較低的西部各省為例，每名大學生每年學雜費以及生活費至少在 7000 元以上，其中包括學費 3000 元，最低生活費 3000 元，公寓費 800 元，書費 400 元。這對於人均純收入僅有 2157.91 元的西部各省農民而言，三個人工作一整年還養不起一個大學生。⁹⁷在東北，據吉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調查，2004 年吉林省大學生人均學費 6000 元，住宿費 1000 元，伙食費 4800 元，一年的費用為 1.18 萬元，但是 2004 年吉林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才 3000.42 元，這表示東北農民每四個人才能供養一個大學生，困境比西部的農民更為嚴重。⁹⁸

四、醫療問題

中共自從 1989 年實施醫療機構「自主化」改革以來，到 2004 年止，全大陸綜合醫院的門診費用平均上漲了大約十一倍，住院費用則上漲大約九倍，而同一時期城市居民的平均經濟所得只增加了大約六倍，農村的農民收入更只增加四倍多。⁹⁹因為經濟困難而生病未就診的城市居民有 20.7%，農村居民有 17.7%，總計 18.7%，需住院但未住院的城市居民有 15.6%，農村居民有 22.8%，總計 20.7%。¹⁰⁰因此中國大陸在生病必須就醫的人口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因為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而放棄醫療。¹⁰¹而全大陸截至 2005 年為止，仍有 65.7% 的人口沒有任何形式

⁹⁶ 同上，頁 374。

⁹⁷ 劉芳，〈對西部地區貧困家庭學生、高校收費不能再高了〉，《中國青年報》，2005 年 1 月 18 日，版 2。

⁹⁸ 侯婧珠、彭冰，〈農村學生害怕考大學？〉，《中國青年報》，2005 年 5 月 11 日，版 2。

⁹⁹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220，圖 2。

¹⁰⁰ 同上，頁 221，表 3。

¹⁰¹ 同上，頁 211。

的醫療保險，其中包含 44.8% 的城市居民，以及 79.1% 的農村居民。¹⁰²

醫療保險覆蓋率如此低的原因，是中共官方投入的醫療經費過少以致。2004 年中共國家財政支出中，衛生經費總額為 854.64 億元，其中中央支出 22.39 億元，地方支出 832.25 億元，¹⁰³僅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 2.92%。尤其中央政府支出的比例只佔了不到 0.08%，相較於中央投入在武警部隊支出的 256.16 億元所佔總支出的 0.9%，¹⁰⁴比例顯然過低。即使中共 2004 年全國預算內衛生事業費和衛生基建投資總共為 1274 億元，也僅佔 GDP 的 0.9%，平均分配到每一個居民身上只有 98 元。¹⁰⁵另外中共的醫療資源城鄉分配嚴重不均，據中共衛生部統計，醫療衛生資源約有 80% 集中在城市，其中三分之二又集中在大醫院，用於農村的經費比例，從 1991 年的 20% 降到 2000 年的 10%，其中專項的農村衛生費只有 1.3%，分到每一位農民身上的衛生事業費只有 12 元，是城市居民的 28%。¹⁰⁶在這麼少的經費投入下，大陸農村的衛生單位只有三分之一正常運轉，2004 年每千人當中分配到的醫生數量，農村只有 0.85 人，僅為城市 2.32 人的三分之一，而且農村當中還有 10% 的村單位沒有設置醫療點。¹⁰⁷

除了城鄉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外，醫療改革開啟的收費自主化政策造成各醫療單位收費不斷上漲。大陸綜合性質的醫院每一診療人次的平均醫療費，從 1990 年的 10.9 元，上漲至 2003 年的 108.2 元，漲幅高達 8.9 倍，同期平均每一出院者的住院醫療費用由 473 元升至 3911 元，上漲了 7.3 倍。¹⁰⁸在農村得到的醫療經費匱乏。醫療費用又不斷上漲之下，大陸的農民生病時有 40%~60% 的人因看不起病而致貧或返貧，中西部地區因病無錢醫療而死亡的比例更高達 60%~80%，此情況就連就連中共衛生部官員都坦承情況的嚴重。¹⁰⁹中共衛生部進行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時發現，有 50% 以上的城市人口、87% 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城鄉低收入患者應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達 41%，應就診而未就診、採取自我醫療的比例則城市佔 47%，農村佔 31%，貧困地區未就診未住院比例高達 70%~90%。¹¹⁰另根據中共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的報告，全大陸約有

¹⁰² 同上，頁 136。

¹⁰³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278，表 8-13。

¹⁰⁴ 同上。

¹⁰⁵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71~372。

¹⁰⁶ 同上。

¹⁰⁷ 同上，頁 375。

¹⁰⁸ 同上。

¹⁰⁹ 同上。

¹¹⁰ 同上。

近一億人口沒有獲得任何的醫療服務。¹¹¹

五、社會保障問題

2004 年中共國家財政總支出中，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有 1524.5 億元，佔總支出的 5.35%，¹¹²大約只佔 GDP 的 1%。若加上用於各類職工和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險費支出、財政對社會保障的補助支出、財政用於民政系統優撫、救濟、福利等支出，共計 6715 億元，也只佔 GDP 的 4.9%。¹¹³若再加上社會文教費就大致是中國大陸社會發展的總支出，共計 14206 億元，佔 GDP 的 10.4%。¹¹⁴此比例與其它國家相比仍屬偏低，若以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三項社會發展合計佔 GDP 的比例來比較，則美、法分為 16%和 30%，即使是較落後的波蘭、俄羅斯、伊朗、巴西、南非等國，也佔有 GDP 的 10%~27%之比例。¹¹⁵

社會保障問題就農村而言，被征地農民家庭的生活保障是主要重點。即使是在中國大陸南方經濟水平較高的南方城鎮中，目前被征地農民所能享有的基本養老保險補貼制度提供的養老保障水平仍十分有限，每月只能領到 120~300 元的保險金，比所處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還低。¹¹⁶2004 年全大陸共有 1887 個縣推動農村社保工作，計有 5387 萬農民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累積保險基金 285 億元，有 205 萬人領取養老金，而全年保險金支出 20 億元。¹¹⁷另外中共在全國 1200 多個縣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加入農村低保的人數有 488 萬。¹¹⁸截至 2005 年 9 月，社保在農村的普及率只有 13%，且多集中在少數城市和沿海地區。¹¹⁹2004 年中共社保基金合計收入 5780.3 億元，支出為 4627.4 億元，累計從 1989 年以來的結餘為 4493.4 億元。¹²⁰但是由於農民的傳統意識和短期利益，農村集體單位支付社會保險分擔額的意願不高，這使得即使在普及率仍低的情況下，這項制度賴以運作的社保基金卻已承受龐大的資金壓力。

另外，社會保險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又與國民就業情況息息相關。據統計中國

¹¹¹ 同上，頁 376。

¹¹² 同上，頁 278，表 8-13。

¹¹³ 同上，頁 372。

¹¹⁴ 同上。

¹¹⁵ 同上。

¹¹⁶ 同上，頁 336-337。

¹¹⁷ 同上。

¹¹⁸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793，表 23-30。

¹¹⁹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36-337。

¹²⁰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799，表 23-39。

大陸從 2007~2010 年，每年增加的就業人口將在 1800 萬人以上，除去死亡、退休、以及就學年齡提高等因素，每年仍有約一千萬的新增工作人口投入就業市場。¹²¹由於大陸農業的人力需求已飽和，因此新增加的勞動力大多要向第二和第三產業轉移。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調查，當前大陸農村勞動力約 4.8 億人，但農村實際需要的勞動力只有 1.7 億人，多餘的勞動力只能轉向非農業或走出農村尋找就業機會。¹²²目前在全大陸 660 多個城市中，農民工已達 1.2 億人之多，而根據中共農業部分析預測，未來十年，農民還將以每年 850 萬人的速度向城鎮轉移，預計今後廿年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的人口將達三億人。¹²³但中國大陸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在以生產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中，由於採用愈來愈多先進技術和設備，就業彈性系數不斷下降。八十年代，大陸 GDP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可以創造 146 萬個就業機會，年均就業彈性系數為 0.3%。但是到九十年代以後，GDP 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只能增加 72 萬個就業機會，平均就業彈性系數下降為 0.11%。¹²⁴從這些數據看來，中共將逐漸面臨整體就業市場無法滿足其龐大人口規模就業需求的困境，這使得提高社會保險覆蓋率的迫切性與日俱增。

六、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的形成除了城鄉戶籍二元化制度、經濟發展政策差異造成之外，中共官方對農村的資源投入不足才是此問題形成的主因。2004 年，中共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共 2357.89 億元，佔國家財政支出比重 8.28%。¹²⁵此比重與農村人口在全大陸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農業和農村經濟在大陸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規模相比，不成比例。這也使得農民在國家投入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必須負擔更多費用在原本是政府應該支應的教育及醫療事項。2004 年，農民人均教育、醫療、藥品費用合計 367.73 元，佔到當年農民純收入的 19.7%，佔到當年農民生活消費總支出的 22.7%，成為食品消費支出之後的第二大生活消費項目，遠超過居住用品和衣著消費。¹²⁶

雖然中共中央宣稱將建設新的社會主義農村，取消 2006 年農民的農業稅，並擴大新的健保制度的試用範圍到 40% 的農村，也將在 2007 年底取消農村義務

¹²¹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200。

¹²² 同上，頁 333。

¹²³ 同上。

¹²⁴ 同上，頁 200。

¹²⁵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274，表 8-6。

¹²⁶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36。

教育學生的學雜費，同時投注在農村醫療保險、農作物補助、農村基礎建設等項目的經費也比 2005 年增加了 14.2%，達到 3400 億人民幣（420 億美元）。¹²⁷但仔細分析後可發現其花在農村的經費並沒有大幅度的增長。根據中共官方公佈的數據，2006 年預計投入農村的經費占中央政府總支出的 8.9%，只比 2005 年的 8.8% 多 0.1%，但比 2004 年的 9.2% 低。即使中共中央說 2006 年中央投入農村的經費將增加 14.2%，這也不代表其支農經費比例大幅增加，因為 2005 年中共政府財政總收入增加了將近 20%，而且預計 2006 年還要再增加 12%。¹²⁸況且宣佈取消農業稅並不表示農民不必繳納其它賦稅，目前大陸農民在購買生產原料時繳納的各類稅款，每年在 4000 億到 5000 億元之間，農民人均繳納的稅款在 200 元以上。¹²⁹

取消農業稅和其它徵稅，讓每個農民一年可以省下 156 元人民幣（美金 19 元），大概是農民平均一年淨收入的 4.8%。¹³⁰但是中央政府這項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卻被各項農業用品物價的快速上漲所抵消。2005 年大陸用於農作的碳氮、尿素、磷肥等化肥平均零售價比 2004 年上漲了 25.85%，農膜上漲 42.1%，水稻種子上漲 76.7%，玉米種子上漲 33.3%，農葯上漲 15.86%。如果按照四川省德陽縣農民進行耕種時投入的成本計算，種一畝水稻、玉米平均投入 165.18 元，比 2004 年增加 37.37 元，增加了 29.2%，因此國家政策給予農民的補貼實際上有 78.3% 被農資漲價因素抵消。¹³¹

伍、國家發展之困境

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確實開啟了經濟發展的契機，也讓中國大陸在經歷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後，綜合國力與改革開放前相較不可同日而語。經濟實力的增長帶動了軍事現代化，中共國防經費在連續十餘年超過兩位數字的成長率挹注下，共軍現代化軍力也確實迅速提升。但是隨著市場機制的深化，中國大陸在政治體制仍屬專制保守的前提下，市場經濟呈現扭曲性的發展，使得國家整體 GDP 快速增加之際，卻也出現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教育、醫療、社會保險、以及三農等與人民切身相關的問題。這些問題能否有效解決，又關係到中共政權統治正當性的維繫，因而對中共領導階層而言，解決人民生活上的這些難

¹²⁷ “Plann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Mar 9th 2006.

¹²⁸ Ibid.

¹²⁹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26。

¹³⁰ “Plann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op. cit.*

¹³¹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27。

題，成為共產黨能否永續執政的迫切挑戰。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國家投注更多經費，這可從中共 2004 年政府歲入 26396.47 億元，但歲出卻有 28486.89 億，出現 2090.42 億元的赤字看出。¹³²而中共政府的赤字在 1989 年時僅有 158.88 億，¹³³到 2004 年時增加了 179 倍。因而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即便維持在目前的水準，政府的財政赤字也會持續增加。

在教育支出方面，2004 年中國大陸的 GDP 為 159878 億元，財政支出則為 28486.89 億元，約佔 GDP 的 18%，其中教育支出有 3365.94 億，僅占 GDP 的 2%。在有限經費的投入下，2004 年全大陸還有 8% 的地區沒有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多集中在西部省區。¹³⁴中共從 2005 年起，對 592 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實施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除雜費和書籍費、對寄宿生補助生活費的政策。而且依中共中央的規劃，2006 年將對農村義務教育免去全部學雜費，特別貧困地區則由政府提供免費書籍和住宿費用，到 2010 年在農村地區全面實施免費義務教育。¹³⁵取消農村義務教育的學雜費，會使政府在未來五年要多花 2180 億元，但是中共中央雖然作了此宣示，卻沒有明確釐清政府的支出該如何支應，只說這筆錢由中央跟地方共同分擔。¹³⁶另外根據中共教育部發佈的“1991~2000 年十年教育發展綱要”，教育經費應佔 GDP 的 4%，則 2004 年支出的教育經費僅達目標的一半，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將其投入在教育領域的經費，從目前佔總支出的 11.8%，增加到 20% 以上，如此將對其財政資源產生相當大的排擠效果。如果要按照中共學者之建議，則預算內教育經費佔 GDP 的比例應提高至 5.5% 左右，¹³⁷這將佔去中共財政支出的 30% 以上，政府財政恐將無法負荷。從上列數據可知，中共長期投入教育領域的資源過少，造成其所謂的「歷史欠債過多」，才會出目前政府財力不足全盤解決問題的困境，這也使得中共面臨必須快速增加教育經費的壓力。

在醫療支出方面，2004 年中共用於醫療衛生的支出為 854.64 億元，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 2.92%，GDP 的 0.5%。而全大陸截至 2005 年為止，仍有 44.8% 的城市人口、79.1% 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全國平均共有 65.7% 的人口沒有任何形式的醫療服務。中共國務院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 2005 年 9 月宣佈，透過現有醫保體制適用範圍的調整修正，將在 2010 年時讓全大陸所有城鎮居民都

¹³²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271，表 8-1。

¹³³ 同上，頁 271，表 8-1。

¹³⁴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36。

¹³⁵ 同上。

¹³⁶ “Plann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op. cit.*

¹³⁷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78。

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障。¹³⁸而從 2006 年開始，國務院也將進一步增加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支出，預計將於 2008 年時在全大陸農村地區達成基本普及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目標。¹³⁹如果中共上述對於城市和農村的醫療政策要具體落實，以目前的醫療服務覆蓋率來計算，那麼中共 2004 年支出的醫療衛生經費僅達需求標準的三分之一，若要建構足以覆蓋全大陸人口的基本醫療服務網，以 2004 年的標準，中共每年需增加超過 1700 億的經費，這將使其用於醫療衛生的財政支出達到 2560 億，佔政府總支出的 9% 左右，為當年 GDP 的 1.6%，比目前增加一個百分點以上。

而且中共從 2003 年起在農村推動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其籌資額為人均 30 元，但 2004 年大陸農村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為 130.6 元，人均 30 元的新型合作醫療總籌資額並不能提供參保的農民較好的醫療保障，¹⁴⁰同時這 30 元中，農民必須自付 10 元，其餘 20 元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各負擔一部分，但是地方政府由於各種財政因素，是否有錢支付仍有問題。因此若中共想要建立一套符合現代國家標準的醫療保險制度，恐怕必須付出比上述推算金額更為龐大的經費才行，而這也會對其政府財政總支出產生一定程度的預算排擠效應。

在社會保障支出方面，2004 年中共投入的經費只佔財政總支出的 5.35%，大約 GDP 的 1%，加上各類社會保險救濟等支出也僅佔 GDP 的 4.9%，比例偏低。中國大陸目前各城市公佈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平均值是當地居民人均月實際收入的 22.2%，¹⁴¹低於當地居民每月用來購買食品所須的平均消費水準，¹⁴²故中共官方對城市居民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並不能夠滿足居民基本生活所需。但即使如此，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措施仍優於農民，在 2005 年以前，中共並未在農村實施類似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2005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有條件的地方要積極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施政方向，¹⁴³算是正式朝向建設普遍化的國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方向發展。在此之前，農民人口之中只有部分失地農民享有基本的養老保險補貼制度，但每個月也只能領到 120~300 元不等的保險金，平均低於聯合國界定一人一天一美元的貧窮標準。目前中共實施的城鄉社會保障機制，覆蓋率約為 30%，¹⁴⁴若要如學者建議提升到

¹³⁸ 同上，頁 200。

¹³⁹ 同上，頁 336。

¹⁴⁰ 同上，頁 215。

¹⁴¹ 同上，頁 168。

¹⁴² 同上，表 5，頁 170~171。

¹⁴³ 同上，頁 173。

¹⁴⁴ 同上，頁 379。

60%，就必須調整國家財政支出結構，從佔 5.35% 的比例調整為 10.7%，GDP 則增為 2%。這還僅是維持目前官方提供的保障水準，若要符合聯合國的標準，那麼所需經費還得再增加。

整體而論，2004 年中共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用於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教育費附加支出、以及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等，共為 8518.63 億元，佔政府財政總支出的 30%，全部 GDP 的 5.3%。¹⁴⁵若要依大陸學者建議將社會發展總支出調高為 GDP 的 17%，¹⁴⁶那麼以 2004 年的政府財政總收入 26396.47 億元佔 GDP 的 16.5% 來計算，意味著政府財政總收入必須全部投入，尚餘 799.4 億元的財政缺口。這對其它同樣極需政府投入更多資源的部門而言，將形成巨大的預算排擠壓力。例如為了解決農民經濟困境，中共宣佈將取消農業稅以及其它與農民有關的稅賦，此政策可讓每位農民一年省下 156 元，約為農民平均一年淨收入的 4.8%，但是這卻會讓地方財政出現 1030 億元的缺口，而這個缺口的四分之一要由地方政府自籌。¹⁴⁷

由此可知，未來中共中央必須投入更多經費於因為貧富差距擴大導致貧困人口居高不下的貧困救濟工作上、城鄉差距導致農村發展停滯的農村基礎建設上、各級教育收費過高導致學生讀不起書的學雜經費補助上、擴大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的覆蓋率所須的支出上、以及解決三農問題的各項政策性投資上。在政府必須花更多的錢在社會領域以滿足人民生存所需時，中共國防經費的增加將有其限度，2004 年中共國防支出為 2200.01 億元，佔財政總支出的 7.7%，加上武警支出 287.09 億元，共佔總支出的 8.7%，為 GDP 的 1.6%。若加上隱藏性的支出，則中共花費於國防事務的經費在政府財政支出中所佔比例並不低。即使中國大陸的 GDP 持續成長，在政府必須投入愈來愈多的經費以支應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支出，導致出現預算排擠效應之下，國防經費不太可能恢復到 1980 年時佔 GDP 的 4.3% 或 1989 年 2.8% 的水準。故對中共而言，經濟力發展的成果，能夠挹注到軍事力發展之領域者，將愈趨有限。

陸、建構新安全觀之動機與意涵

國家安全對中共領導階層而言，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永續執政，自從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發展經濟早已取代了毛澤東時代對意識型態的堅持，成

¹⁴⁵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27，表 8-13。

¹⁴⁶ 汝信等主編，前揭書，頁 378。

¹⁴⁷ “Plann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op. cit.*

為維繫中共政權於不墜的唯一選擇。江澤民主政時，仍延續鄧小平對安全觀、經濟力和軍事力三者之間互動關係的看法。江指出當前的國際局勢「為我們集中精力發展國民經濟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外部環境」¹⁴⁸，而在論及軍隊現代化建設和國家經濟建設二者間的關係時，江則明確表示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軍隊現代化建設要以國家經濟建設為依托，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大局。¹⁴⁹對江澤民而言，經濟仍是安全觀、經濟力、軍事力三角關係中的主軸。但是江與鄧不同之處在於在經歷 1996 年台海危機後，中共領導階層在國家安全的認知上體認到若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則美國必然介入，而共軍目前尚無能力在台海抗衡美軍，因此江澤民在 1996 年之後加大了對國防經費的挹注，並且在 1998 年下令停止軍隊經商。¹⁵⁰雖然江禁止軍隊經商主要著眼於整頓自鄧小平允許軍隊經商後形成軍中嚴重的幹部貪腐與訓練廢弛問題，但是希望藉此讓軍隊朝向精兵化與專業化建軍，培養現代化作戰能力，也是考量之一。¹⁵¹由此看來，江澤民在 1996 年之後已逐漸修正鄧小平偏重經濟的策略，開始增加對軍隊建設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當中的比重。

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後，進一步調整經濟發展和軍隊建設二者間之比例，2004 年 7 月 24 日，胡在主持以“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發展”為主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本依托，經濟建設搞不上去，國防建設就無從談起。國防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防建設搞不上去，經濟建設的安全環境就難以保障」。¹⁵²胡錦濤對於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二者互動關係的看法，與鄧小平偏重經濟，要求軍隊要服從這個大局的態度不同。¹⁵³胡已體認到中國所處的安全環境並非全然穩定，台海局勢隨著陳水扁連任總統迅速向台獨方向傾斜，美國雖然宣稱不希望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但是美台之間的軍事合作卻日趨緊密，美日之間的軍事合作也將美日安保條約「周邊有事」的適用範圍擴及台海區域，而且美軍在發動反恐戰爭入侵阿富汗推翻支持恐怖主義的塔里班政權後，就一直拒絕撤出阿富汗，故美軍在中國東西兩面都有駐軍，形成對中國的包圍態勢。另外近年來美國每年

¹⁴⁸ 江澤民，《國際形勢和軍事戰略方針》，前揭書，頁 80。

¹⁴⁹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同上，頁 273。

¹⁵⁰ 江澤民，《軍隊必須停止一切經商活動》，同上，頁 321-334。

¹⁵¹ 江澤民在指示軍隊必須停止經商時，就提到軍隊在和平時期的任務就是養兵，「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軍隊要集中精力「養好兵」，見江澤民，同上，頁 325。

¹⁵² 〈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解放軍報》，2004 年 9 月 30 日，版 6。

¹⁵³ 鄧小平為了發展經濟，曾要求軍隊必須樹立“忍耐”的思想，並指出「在本世紀剩下的時間裡，國防費用不可能有很大的增加」，參閱王成斌主編，前揭書，頁 88。

公佈一次的「中國軍力報告」、四年公佈一次的「國防檢討報告」、以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每年發佈的「東亞戰略概觀」之內容中，多指陳中共軍事力量的擴張將威脅亞太區域秩序的和平穩定，¹⁵⁴而歐盟仍然維持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這都呈現出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崛起仍抱疑慮。

外部環境對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壓力增加，使得中共領導階層調整了過去重經濟輕軍事的發展策略，改為二者併重協調發展，如果中國要挺身抗衡國際社會加諸其身的敵意，意味著北京當局需要投入更多的國防經費，中共自 1998 年以後，每年官方公佈的國防經費增長金額都超過 100 億人民幣，2001 年以後更每年增加 200 億元以上，2006 年則暴增 391 億，達到 2838 億元，¹⁵⁵而中共在 1985 年的國防經費只有 191.53 億人民幣，¹⁵⁶換言之，中共在 2001 年以後每年的國防預算增加額度，都超過 1985 年全年的國防經費一倍以上，而 2006 年增加的部分更達到 1985 年全部金額的兩倍。國防經費的成長顯示中共領導階層對外部安全環境認知的變化，並且以加速軍事力的成長作為因應。

另一方面，在外部環境存在隱憂之際，胡錦濤面對的大陸內部局勢，則要比前任領導人主政時期嚴峻許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推動至今雖然成功地解放了中國的生產力，讓 GDP 從 1978 年的 3624.1 億人民幣，¹⁵⁷增加到 2005 年的 182321 億元，¹⁵⁸成長了 50 倍。但是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卻也造成財富分配不均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城鄉發展嚴重失衡、教育和醫療費用高漲、以及社會安全網不足以支撐因為經濟發展導致下崗的國營企業職工和失地農民之基本生活需求等。目前中國大陸不到 0.5% 的人口擁有超過 60% 以上的個人財富，而在這 0.5% 富有人口中，也有 70% 的財富掌握在資產超過五十萬美元的家庭手中。¹⁵⁹根據 2004 年的調查，大陸城市內部個人年收入「基尼係數」已達 0.529，人均家庭收入基尼係數更高達 0.561，¹⁶⁰貧富差距嚴重程度已接近引發社會動亂

¹⁵⁴ 美國國防部 2005 年 7 月公佈「2005 中共軍力報告」第二章討論中國戰略時，指出中國軍隊現代化，對東亞區域其它國家構成威脅；2006 年 2 月公佈「四年一度國防檢討報告」第二章討論戰略問題時，則指出中共軍力擴張已逾越其所稱「和平崛起」之國防基本需求，將成為美國之最大威脅；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 2006 年 3 月公佈「東亞戰略概觀 2006」，在第四章討論中國問題時，明確指出中共是東亞區域安全的問題製造者。

¹⁵⁵ 〈中國防預算 351 億美元 增長 14.7%〉，《中國時報》，2006 年 3 月 5 日，版 A13。

¹⁵⁶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前揭書，頁 273，表 8-4。

¹⁵⁷ 同上，頁 51，表 3-1。

¹⁵⁸ 中共國家統計局，〈“十五”時期城鄉居民生活改善情況〉，前揭公報，表 14。

¹⁵⁹ 〈0.5% 家庭擁有全國逾六成財富 大陸貧富差距 勝過美十倍〉，同註 64。

¹⁶⁰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新聞稿，〈大陸貧富差距擴大嚴重衝擊社會穩定〉，民國 94 年 5 月 27 日編號第 087 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www.mac.gov.tw>〉。

的 0.6 臨界點。另外根據中共官方統計，2005 年全大陸公共滋擾事件達到八萬七千件，較前一年增加一萬三千件。¹⁶¹

2005 年 2 月胡錦濤在中共中央黨校一次省部級幹部研討會上，提出要「建構和諧社會」的概念，¹⁶²隨後在 3 月舉行的全國「兩會」，也以此作為討論主軸。此概念的提出顯示中國大陸嚴峻的內部情勢讓中共領導階層認知到必須調整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追求高經濟成長的政策，投入更多國家資源於各項社會部門，以解決人民生活具體問題，才能撫平日趨高漲的民怨；同時針對各地層出不窮的群眾抗爭事件，也必須提升各地武警與治安機關鎮壓動亂的能力，以維繫政權穩定。解決人民生活具體問題必須提高各項社會福利政策支出，由於中國大陸人口規模的龐大以及人均 GDP 仍不足 2000 美元，¹⁶³使得解決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救濟等迫切問題所需要的經費十分驚人，遠超過目前政府實際投入的金額。

外部安全環境的壓力讓中共領導階層警覺到加速軍事力成長的必要性，因而近年來中共國防經費成長迅速；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內部局勢也由於政府公共政策未能滿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使得民怨日增而逐漸惡化，這讓中共領導階層愈趨體會到必須更認真地投入更多資源，來解決人民的生存問題，否則民怨高漲的結果將危及到中共產黨的統治基礎。¹⁶⁴不論是加速軍力成長或是解決民眾需求，都必須以經濟力作為支撐，而經濟發展需要穩定的環境，因此中共領導人在國際場合提出建構國際秩序的新安全觀，強調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就是要藉由安全對話與經濟合作，來建構一個對中國而言穩定的外部環境，以便使其能夠繼續推動已持續十餘年快速的經濟成長。對中共而言，藉由提倡新安全觀來建構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除了可以緩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抱持的疑慮，以減輕外部安全壓力俾利其內部市場經濟體制的持續發展之外，更使北京當局能夠減緩軍事支出的增加速度，挪出更多經費投入到人民急需的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政策上，以解決伴隨經濟快速成長而來的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減輕對中共領導階層而言恐怕是目前最有可能威脅其政權安全迫在眉睫的內部社會壓力。

由此可知，胡錦濤延續了江澤民所提倡的對外「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觀，以表達中共追求國際秩序和平穩定的態度與期盼，其動機除了有利

¹⁶¹ 〈中共鎮壓 危害國家穩定〉，《中國時報》，2006 年 2 月 4 日，版 A13。

¹⁶² 胡錦濤是在 2005 年 2 月間參加此研討會並發表談話，但是講話全文遲至 6 月 26 日才由新華社對外公佈，見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 年 6 月 27 日，版 1。

¹⁶³ 中國大陸 2005 年人均 GDP 為 1703 美元，見中共國家統計局，前揭公報。

¹⁶⁴ 胡錦濤在闡述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性時，指出「構築和諧社會是中國共產黨鞏固執政地位的社會基礎」，參閱胡錦濤，同註 162。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外，更隱含希望藉由外部環境的穩定，讓北京當局得以全力解決內部愈趨嚴重的統治正當性危機之意涵。¹⁶⁵

參考資料

一、專書

1.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2005 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2.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
3. 江澤民，《論國防和軍隊建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4. 汝信等主編，《社會藍皮書，2006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5. 高連升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
6. 《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3 卷。
7. Evan S. Medeiros, *Testimony: Analyzing China's Defense Industr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CA: RAND Corporation, 2004) .
8.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Y2004 Report to Congress on PRC Military Power-pursuant to the FY 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USA.
9.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Pursuant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 2000, USA.
10.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6, 2006.

二、期刊論文

¹⁶⁵ 胡錦濤於 2005 年底布希訪問北京與其會晤時，就私下向布希表示他每天光是處理肅貪、農村騷亂、貧富差距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就已經精疲力盡，中國無力也無意挑戰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主宰地位。見 Joseph Kahn, "In Candor From China, Efforts to Ease Anxie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2006.

1. 〈中國軍隊人才戰略工程揭秘〉，《鏡報》（香港），2003年8月號。
2. “Plann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Mar 9th 2006.

三、報紙

1. 〈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97年4月24日，版1。
2. 江澤民，〈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9月7日，版1。
3.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人民日報》，2000年9月16日，版1。
4. 〈江澤民：在國防科技大學成立五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3年9月2日，版1。
5.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調整充實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決定〉，《人民日報》，2004年9月20日，版2。
6. 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年6月27日，版1。
7. 〈我國去年GDP達159878億元〉，《人民日報》，2005年12月21日，版1。
8. 劉芳，〈對西部地區貧困家庭學生、高校收費不能再高了〉，《中國青年報》，2005年1月18日，版3。
9. 侯靖珠、彭冰，〈農村學生害怕考大學？〉，《中國青年報》，2005年5月11日，版3。
10. 〈中俄聯合軍演 傘降突擊 中方戰力遜色〉，《中國時報》，2005年8月22日，版A13。
11. 〈0.5%家庭擁有全國逾六成財富 大陸貧富差距 勝過美十倍〉，《中國時報》，2005年12月16日，版A9。
12. 〈中共鎮壓 危害國家穩定〉，《中國時報》，2006年2月4日，版A13。
13. 〈中國防預算351億美元 增長14.7%〉，《中國時報》，2006年3月5日，版A13。
14. 〈第三顆北斗導航定位衛星發射成功〉，《解放軍報》，2003年5月25日，版1。
15. 〈成都軍區某部近似實戰條件下開展對抗演練〉，《解放軍報》，2003年8月20日，版1。

16. 〈江澤民鄭重宣告：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我軍再裁減員額 20 萬〉，《解放軍報》，2003 年 9 月 2 日，版 1。
17. 〈中央軍委頒發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解放軍報》，2003 年 9 月 8 日，版 1。
18. 〈我軍首次試行直接從公民中招收士官〉，《解放軍報》，2003 年 11 月 5 日，版 2。
19. 〈總參部署全軍新年度軍事訓練工作〉，《解放軍報》，2004 年 2 月 1 日，版 1。
20. 〈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解放軍報》，2004 年 9 月 30 日，版 6。
21. 《香港文匯報》，2004 年 3 月 3 日，版 2。
22. 《香港文匯報》，2004 年 7 月 17 日，版 2。
23. 《香港文匯報》，2004 年 8 月 9 日，版 2。
24. David S. Cloud, “Navy to Expand Fleet with New Enemies in Mind”,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2005.
25. Joseph Kahn, “In Candor From China, Efforts to Ease Anxie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2006.

四、網際網路

1. 中共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5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共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
2.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洲共同使團，〈中歐將簽署伽利略計劃技術協定〉，2004 年 5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洲共同使團》，〈<http://www.chinaembassy-org.be>〉。
3. 中華民國外貿協會，《1979 年主要國家平均每人 GDP》，《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網站》，〈http://www.investintaiwan.org.tw/theme01_c/c_t01_01_10.htm〉。
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新聞稿，〈大陸貧富差距擴大嚴重衝擊社會穩定〉，民國 94 年 5 月 27 日編號第 087 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www.mac.gov.tw>〉。

（投稿日期：95 年 8 月 31 日；採用日期：95 年 11 月 6 日）